

朱丹溪及其学术的理学渊源

★ 焦振廉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 西安 710003)

摘要:朱丹溪为元代著名医家,为金元时期养阴派的代表,其“滋阴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章就其生平及其学术的理学渊源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朱丹溪;理学渊源;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R 2-09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Zhu Danxi Himself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Origin of His Learning

JIAO Zhen-lian

Shanxi Provi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710003

Abstract: Zhu Danxi was the famous doctor of yuan dynasty, He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ourish yin in Jin and Yuan dynasty. His “nourish yin theory” had made great influence. Here discussed on his story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origin of his learning.

Key words: Zhu Danxi; Neo-confucianism origin; Learning thinking

朱丹溪,元代医家,主“滋阴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关于朱丹溪学术已有很多讨论,文本兹就其生平为人及其学术的理学渊源略述一二管见。

朱丹溪是享誉当时并在后世受到广泛推崇的医家。当时学者戴良称“丹溪翁者,婺之义乌人也,姓朱氏,讳震亨,字彦修,学者尊之曰丹溪翁”(戴良《丹溪翁传》,下作“《丹溪翁传》”),是由于“先生所居曰丹溪,学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称之曰丹溪先生云”(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下作“《石表辞》”)。宋濂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与朱丹溪交厚,朱丹溪去世后,宋濂“中心尤摧,咽不自胜”(同上),撰《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其中对朱丹溪的先世追溯到了西汉后期留下“朱云折槛”故事的槐里令朱云。不过朱丹溪家族到宋元之际已非名族钜姓,朱丹溪的祖父朱环只有一个“乡贡进士”亦即举人的身份。宋濂称朱丹溪“尚侠气,不肯出人下。乡之右族咸陵之,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同上)。“右族”即大族,为“右族”所陵,可知为普通人家,朱丹溪称自己“穷而在下”(同上),大约由此。后来,许谦在八华山讲学,朱丹溪“复往拜焉,益闻道德性命之说,宏深粹密,遂为专门”(《丹溪翁传》)。许谦,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与朱丹溪同郡。宋代朱熹总结理学,传于黄榦,黄榦传于何基,何基传于金履祥,许谦则是金履祥的弟子。这样,许谦可算是承朱熹四传之学。实际上,朱熹之学虽经此传承,但至金履祥去世,“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

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脱脱《元史·许谦传》,下作“《许谦传》”),所以,真正发扬光大朱熹之学的是许谦,朱熹之学传承的世系是因为许谦的成就而反推出来的。许谦在八华山讲学,“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同上),但朱丹溪竟他是最优异的弟子。朱丹溪也从此与理学结下了不解的因缘,即使在成为享誉四海的医家后,也终于不能脱离理学的影响,他甚至力图以理学的观点解释医学。据说朱丹溪得闻许谦之学后,“自悔昔之沉冥颠沛,汗下如雨”(《石表辞》),从此“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数年,而其学坚定矣”(同上)。朱丹溪大约参加过两次乡试。古时参加乡试中式,是取得入仕资格的最低门槛,但朱丹溪两次都没有跨过这个门槛,所以宋濂说他“再往,再不利”(同上)。

朱丹溪步入医林,缘于母亲患病,也缘于许谦建议。许谦曾对朱丹溪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丹溪翁传》)朱丹溪慨然承命,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同上)可知古时读书人以“仕”为人生目标的概念是何等执着。朱丹溪医术精进,得益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的传授。在遇到罗知悌之前,朱丹溪曾对当时局方流行的弊端发出感慨,认为“古方新证,安能相值乎”(《石表辞》),但“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

《素》、《难》诸经乎”(《丹溪翁传》)。可知他当时即有为医学“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的心志,但“吾乡诸医鲜克知之者”(同上)。于是,他外出求师,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终于在武林(今浙江杭州)得遇罗知悌。罗知悌从学于荆山浮屠,而荆山浮屠是刘完素的弟子,其学术渊源是清晰而明确的。罗知悌不是性情随和的人,宋濂称其“性倨甚”,戴良称其“性褊甚,恃能厌事,难得意”,大约属于恃才傲物一流。但朱丹溪不仅使罗知悌“修容见之,一见如故交”(《石表辞》),而且“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丹溪翁传》)。朱丹溪拜别罗知悌后,他的学术已非昔日之比,亦非寻常医者所及,于是戴良才有“乡之诸医泥陈裴之学者,闻翁言,即大惊而笑且排”的说法。但这种“笑且排”并不影响朱丹溪学术的精进和声名的传播,最终的结果是,朱丹溪以“倒仓法”治疗许谦的痼疾大获效果后,那些“大惊而笑且排”的医者不仅对朱丹溪“心服口誉”,甚至请求做他的弟子,朱丹溪从此声名远播,以至“四方以病来迎者,遂辐辏于道”(《丹溪翁传》)。

朱丹溪是许谦的“高第弟子”(《许谦传》),但其主要成就还是在医学方面。他曾说:“义理精微,礼乐制度,吾门师友论著已多悉,吾可以无言矣。故其所述独志于医为多。”(《石表辞》)因而其著作主要为医书,今传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但朱丹溪声望又不仅来自医学。朱丹溪去世后,戴良称“翁之卓卓如是,则医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讲学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为翁墓志,兹故不录,而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为翁传,庶使后之君子得以互考焉”,可知朱丹溪一生成就既在于医学,还在于“讲学行事”。“吾友宋太史濂所为翁墓志”即宋濂所撰《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其间虽亦涉医学之事,但更多记录了朱丹溪“讲学行事之大方”。“大方”一词出《庄子·秋水》,即“大道”,后以指儒家所奉行的修身齐家经国济民之学。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载述朱丹溪事迹若干,如建造家祠“以奉先世神主”,因“苛敛之至”而代表里人向官府直面陈词,倡议修筑蜀墅塘以利灌溉田地,乃至“县令长或问决狱得失,先生必尽心为之开导”,等等,可知朱丹溪虽遁迹于医林,却时时从“士”的角度关注着民生,参与社会。由于如此,“方岳重臣及廉访使者,闻先生名,无不愿见,既见,无不欲交章荐之”(同上),但朱丹溪皆力辞不就。古时受到朝廷或地方官府征聘而未曾就职的人,被称为“征君”或“聘君”。朱丹溪显然是有这种经历

的,宋濂在《赠医师葛某序》中所称“家世习儒,至聘君始以医鸣,医家诸书无不精览”的“朱聘君”,应当就是朱丹溪。朱丹溪又是恪守儒家信念的人,其为人“简恣贞良,刚严介特。执心以正,立身以诚,而孝友之行,实本乎天质。奉时祀也,订其礼文而敬泣之;事母夫人也,时其节宣以忠养之。宁歉于己,而必致丰于兄弟;宁薄于己子,而必施厚于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论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忧”(《丹溪翁传》),虽是概括之语,但一位忠谨克己而敢于任事的士人形象已跃然纸上。

朱丹溪不是迁就敷衍的人,所以宋濂称他“少负任侠之气,不少屈挠,及闻道德性命之说,遽变之而为刚毅”(《石表辞》),戴良称他“苟见枝叶之辞,去本而末是务,辄怒溢颜面,若将浼焉”(《丹溪翁传》)。求见罗知悌,“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石表辞》),可见其坚忍之心;为患者出诊,“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同上),可见其勤勉之心;“寥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同上),可见其恻隐之心;“居室垣墉,敦尚俭朴,服御唯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安之如八珍”(同上),可见其节俭之心;“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同上),可见其果敢之心;“清明坦夷,不事表倖,精神充满,接物和粹,人皆乐亲炙之”(同上),可见其平和之心。戴良称“若翁者,殆古所谓直谅多闻之益友,又可以医师少之哉”(《丹溪翁传》),虽稍嫌有贬损医学的意味,却概括了朱丹溪处世为人的特点。

朱丹溪出于许谦门下。许谦为元代理学大家,弟子甚众,影响甚大,以至“及门(谓做弟子)之士著录者千余人”(《许谦传》),而朱丹溪“清修苦行,绝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成为许谦弟子中惟一被列入附传的。朱丹溪得许谦之传而通于理学,得罗知悌之授而精于医术,不仅“四方以病来迎者,遂辐辏于道”,而且“或以医来见者,未尝不以葆精毓神开其心。至于一语一默,一出一处,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诲,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丹溪翁传》),所以戴良说“翁在婺得道学之源委,而混迹于医”。所谓“混迹于医”,是由理学而从事医学的意思。由于如此,才每每对“以医来见者”“以葆精毓神开其心”,才每每对“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诲”,而“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正所谓“所至人多化之”。可知朱丹溪在临证诊治的同时,更注重将理学的“天理人欲”及“三纲五常”观念与医学和养生防病联系起来,希望人们加强性情修养,

以减少或杜绝疾病的发生。

北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全文不过两百余字，却开宋元理学之先河，其全文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之至矣。”

朱丹溪认为“《内经》之言火，盖与太极动而生阳五性感动之说有合”（《丹溪翁传》），显然关联医学与理学的意味。弟子赵良仁向朱丹溪请教“太极之旨”，他则“以阴阳造化之精微与医道相出入者论之，且曰：吾于诸生中未尝论至于此，今以吾子所问，故偶及之，是盖以道相告，非徒以医言也。赵出，语人曰：翁之医，其始橐籥于此乎？”（同上），可知理学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医学。所以，由理学而从事于医学，从理学的角度看待医学，并力图将理学的观点引入医学，是朱丹溪不同于其他医家的重要特色。

朱丹溪学术的核心观点是“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因而被后世称为“滋阴派”。其所以强调“滋阴”，是因为人体多“阳有余阴不足”，而之所以“阳有余阴不足”，是因为人体的先天禀赋以及“相火”的戕贼。就先天禀赋而言，“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由于日为实属阳，月常缺属阴，而且是“禀日之光以为明者”，而“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宝命全形论》），所以人便不能不禀天地日月之气而成“阳有余阴不足”之身。就后天因素而言，“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人为万物之灵，是不能不“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太极图说》）的，于是相火之“易

动”是经常的，甚至是会“翕然而起”的。但是，这种由“五性感物”而生的相火“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格致余论·相火论》），于是不能不是“元气之贼”了。要使相火不成为“元气之贼”，朱丹溪提出：“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同上）在这里，“人心”当是人之情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彼此无差的，“道心”则需要经过一番修炼的工夫而后方可具备，而这番修炼工夫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于是，朱丹溪提出“主之以静”，提出“收心养心”，撰写“饮食色欲箴序”，皆本“滋阴”而出。

朱丹溪的“滋阴”学术思想既基于临床实际，又与当时官宦豪富之家的奢靡风习有关，更受到理学观点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滋阴”是用于救治其阴已虚的，是补救之法，而要使其阴不虚，则在于“葆精毓神”。在朱丹溪看来，“葆精毓神”不仅是指节制房事饮食等方法或技术，更是思想观念和性情修养的结果，所以他才对“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诲”（《丹溪翁传》）。在这里，我们不难找到朱熹“明天理，灭人欲”警句的影子。

由于人身本是“阳有余阴不足”，加之相火的戕贼，于是病者多见阳盛及阴虚阳盛的病机。朱丹溪针对火热虚实病机，提出“实火可泻，黄连解毒之类；虚火可补，小便降火极速”（《丹溪心法》卷一）。在《格致余论·痘疮陈氏方论》中，朱丹溪有“从子六七岁时患痘疮发热”用黄连解毒汤加白术治愈的案例，是为“实火可泻”；在《本草衍义补遗·人尿》中，朱丹溪有“一老妇年逾八十，貌似四十……人教之服人尿”的案例，是为“虚火可补”。综观朱丹溪医案，这一原则始终是贯串其中的。

朱丹溪的学术以“滋阴”为核心，但又不限于此。仅一部《格致余论》便有医论42篇，以养生言之，有养老论、慈幼论等；以诊法言之，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以病症言之，有痛风论、痰症论等；以病机言之，有夏月伏阴在内论等，以治法言之，有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张子和攻击注论等；以方药言之，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以妇女病言之，有难产论、胎自堕论等。可知朱丹溪之学绝不限于“滋阴”。认为朱丹溪以《内经》等经典著作为依据，以宋元理学观点为指导，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三家论说为借鉴，开创了以“滋阴”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应该还是比较公允的观点。

（收稿日期：2009-03-24）